

抗战时期四川酒类产量及发展特点

肖俊生

【摘要】 民国时期是四川酿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44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四川酿酒业的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文章考证了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分析了川酒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 抗战时期;四川;酿酒业;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2-0105-8

酒的生产与销售是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自清代以来,酿酒业蓬勃发展。在近代,川酒的产量均高于全国其它省份。抗战时期是四川酒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44年川酒产量达22万吨以上,这个纪录直至1978年后才被超越。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与分析均对抗战期间的川酒产量及规模语焉不详,或分歧甚大。本文拟就川酒产量、规模、特点及快速发展的原因再作认真分析。

一、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

发展阶段。川政统一后酿酒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主要产酒区域的产量、规模及糟房数量均有显著提高。江津县1935年7—12月月产酒74万斤,到1945年6—12月月产酒达136万斤,年产1633万余斤,比10年前增产近90%^[1]。犍为县1938年产酒2578万斤^[2]。非主产区之达县,也能生产多个品种的酒,仅烧酒就有“城乡糟房数百家”^[3]。

表1是四川各税务所统计的1936年和1938年的酒产量,它能让我们看到抗战前期四川各地产酒的全貌,若考虑到偷逃漏税情况,实际产量要比表中数据略高(参见表3)。

本文是2010年度四川省规划课题《近代四川酿酒业发展研究(1904—1949)》(编号SC107B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据统计,1957年四川产酒14.06万吨,1958—1978年四川年均产酒约21万吨,1985年产酒85.7万吨。(《当代四川》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作者简介〕 肖俊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表1 1936、1938年四川各地酒类产量

单位: 万斤

税务所名称	1936年	1938年
川东税务管理所(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	1 470	2 497
合川、武胜税务分所	316	313
铜梁、南川、大足税务分所		298
万县、开县、梁山、忠县税务分所	720	935
涪陵、丰都、长寿、垫江税务分所	173	343
渠县、营山、邻水、广安、大竹税务分所		930
开江、达州、宣汉、万源、城口税务分所	35	309
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税务分所	263	333
彭水、石柱、秀山、酉阳、黔江税务分所	36	81
川南税务管理所(乐山、井研、犍为、峨边、夹江、洪雅、峨眉、青神、丹棱)	502	517
仁寿、彭山、眉山税务分所	345	415
雅安、汉源、名山、邛崃、大邑、天全、荥经、芦山、新津、蒲江税务分所	211	231
西昌、冕宁、会理、盐边、越西、昭觉、盐源税务分所	94	147
川西税务管理所(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双流、金堂)		212
资阳、简阳、乐至税务分所	812	1 023
什邡税务分所		93
彭县、广汉税务分所		306
绵竹税务分所	320	420
中江、德阳、罗江税务分所	453	518
绵阳、彰明、江油、平武、梓潼、安县、北川税务分所	129	260
崇宁、崇庆、灌县、汶川、茂县、松潘、理番、懋功、宝兴税务分所	66	194
郫县税务分所	1	1
川北税务管理所(阆中、巴中、南部、苍溪、仪陇、剑阁、通江、南江)	206	239
昭化、广元税务分所	2	5
三台、射洪、盐亭税务分所	386	477
遂宁、南充、西充、岳池、蓬安、蓬溪税务分所	721	681
永宁税务管理所(泸县、合江、纳溪、江安、隆昌、荣昌、富顺)	854	1 315
内江、资中、荣昌、威远、安岳税务分所	1 453	1 537
宜宾、南溪、高县、庆符、筠连、雷波、屏山、马边税务分所	354	444
叙永、古蔺、长宁、古宋、兴文、珙县税务分所	119	227
合计	10 041	15 301

资料来源:1936年见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学报》创刊号第90页附表,1937年1月。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38年见四川省财政厅编《四川财政汇编》第3章“税捐”第124-126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两年中川酒产量增加了50%,其间还经历了1936年的特大灾荒。其中年产量超过200万斤的县有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合川、铜梁、万县、涪陵、广安、犍为、仁寿、彭山、资阳、简阳、彭县、绵竹、中江、三台、射洪、遂宁、南充、泸县、富顺、隆昌、内江、资中、荣昌、宜宾、蓬溪

等约31县。两年中,川东税务所增长1 000万斤以上,永宁税务所增长500万斤,资阳、简阳、乐至税务所也增长200万斤以上,三地增长占全省增幅的1/3,而三所辖区正是酒业发展重点区域。

下表反映的是1943、1944年成渝公路沿县的糟房规模及酒产量。

表内缺潼南县、西康康属各县、宁属部分县的统计。同时,为了计算的方便,笔者以“万斤”为单位,进行了四舍五入的折算。

表2 成渝公路沿线各县1943、1944年白酒产量一览表

产量单位:万斤

县别	年别	作坊平均数	酒桶平均数	年产量(税务机关报告)	实际年产量估计
简阳	1943	282	550	257	700
资阳	1943	420	468	223	470
威远	1943	127	222	77	
内江	1943	150	628	574	
自贡	1943	30	38	27	
璧山	1943	110	1254	157	250
富顺	1943	236	535	417	
泸县	1943	503	1487	995	1 400
金堂	1944	39	77	46	10
资中	1944	323	341	265	
隆昌	1944	137	454	278	350
永川	1944	279	892	686	1 300
江津	1944	422	1439	1 531	3 200
巴县	1944	950	1859	1 167	1 800
荣昌		141	602		550
大足		40	200		
总计				6 700	12 267

资料来源: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66—67页,1945年5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从实际产量估计来看,江津、巴县、泸县、永川名列前四位,年产量均超1 000万斤。各县糟坊数量及酒桶数量均比战前增加许多而以巴县排第一位,超过第二位许多。江津除生产白酒外,还产广柑酒、桔柑酒、葡萄酒等品种。仅1942年刘有光集资创办的利农农产贮造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广柑酒5万瓶,被用来招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得其盛赞^[4]。另外,在江津,为糟房提供曲药的工厂在抗战开始后就有10余家,年产曲药数十万斤,销售全县及涪陵、万县等地。

绵竹县1935年共有大曲酒25户,96窖;烧酒106户,625桶;老酒11户,180缸。抗战期间发展迅速。1941年大曲酒36户,153窖;烧酒167户,老酒

14户^[5],均有显著增加。其时,绵竹酒在重庆十分畅销,“恒丰泰”在闹市区邹容路的分店甚至登报“谢客”,以免发生争购、抢购现象,同时决定“晚开门、早关店、价格略高”,生意仍然兴旺。一些批零酒商甚至有预付货款一年者^[6]。同时期泸州大曲、允丰正黄酒、江津白酒在重庆市场的表现也与绵竹酒差不多,仅泸州大曲重庆的销量就占其年产量的一半。

因四川生产的高粱主要用于酿酒,故根据高粱的产量亦可推算出酒的产量。据1944年全省134县的统计(未包括西康),当年高粱产量为10080千市石,折为157 248万斤。按高粱的61%用于生产酒^[7](人食及饲料等用途占39%),出酒

作者以“万斤”为单位,对产量进行了四舍五入的折算。另外,“实际产量估计”之合计非本栏数据之和,原文如此,未作说明。几个空缺县估计是参照其它县份按酒桶数量结合调查资料进行推算的。当时1个酒桶根据生产负荷情况年均产酒1-2万斤之间。1942年政府限定每月最低纳税产量为0.2万斤,全年产量不得低于2.4万斤。糟房普遍有私酿增产漏税情形,故表中税务机关报告的产量只有实际估计产量的54%。

当时的糟房规模以盛原料的“桶”论,政府以“桶”核定月产量及税额。一般糟房只有1、2个桶,月产酒0.1-0.2万斤左右。

四川省江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假设江津年产曲药30万斤,以曲药占原料的2.56%计(川大第四班化学系四川工业考察团:《内江梓潼镇集义荣糟房参观记》:“一石高粱(156市斤)加酒曲4斤”,《四川月报》11卷4期,1937年10月,第17页),江津年产酒至少也在1 170万斤以上。

《四川经济统计》(无作者),《四川经济季刊》2卷2期,1945年4月。第341-346页。当时应有采购外省之高粱,也可能有川省高粱外销情形,但笔者暂缺这方面的资料,故此处不计。

率为40%(当时平均水平)计算,1944年高粱白酒的产量为38 368万斤,比1938年增长近2倍,若加上其它原料如糯米、玉米、青稞、果类生产的酒约6 000万斤(笔者估计),估计当年总产量达44 368万斤以上,为民国时期的最高值。这是战时四川经济的发展在酒业上的反映。

根据抗战期间四川各年高粱产量的统计与估计,我们照上述方法计算出各年高粱酒的产量如下:

表3 抗战期间四川高粱及高粱酒的产量

单位:万斤

年 份	高粱产量	高粱酒的产量
1938	66 066	16 120
1939	142 880	34 862
1940	136 048	33 196
1941	116 579	28 445
1942	126 547	30 878
1943	114 161	27 855
1944	158 621	38 703

资料来源:《(民国)33年夏作产量第一次估计》,《四川省农情报告》7卷10期,1944年10月15日,第7页。四川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档案,四川省档案馆:全宗152,卷65。

说明:本数据采集比较保守、稳妥。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之“各省历年高粱产量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的数据比本表高约1/3,可资参考。

表3反映出,除1938年以外,各年高粱酒的产量均在28 000万斤以上。而前文已述及,1938年川酒产量已有很大提升。可见,抗战期间川酒的产量确有大幅提高,这还不包括其它粮食和果类酿造的酒。但抗战中各年产量有反复,自1939年起,并非阶梯式增长,个别年份有下降,而以1944年的产量为顶峰。

抗战时期,国统区酒业大多凋敝,惟贵州酒业同四川一样发展迅速。1944年贵阳有酿酒酢房及售酒业59家,但营业额只有86 200元(法币),资本额最大的只有1 000元(法币)^[8]。茅台酒声

誉日隆,但受原料及运输的影响,产量十分有限。共有三家酢房生产茅台酒,产量最大的成义糟房(华茅)1944年年产仅4万斤,这是其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9]。但这仅略高于一个四川普通糟房的年均产量,即使售价再高,也难以在财政贡献与经济规模上与四川酒业相比。1940年贵州高粱产量659千市担^[10],折合10 280万斤,为抗战中最高。按前述方法折为高粱酒2 508万斤,也仅相当于四川一个主产县的产量。从全国的高粱产量来看,除东北而外,四川高粱产量是各省中最高的,1944年几与全国可见统计的13省总产量相等^[11],证明四川酿酒业较各省发达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四川酒业发展的特点

四川酒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产量的增长,而且在生产的技术、管理和规模方面呈现出较明显的特点。

首先,酿酒工艺趋于成熟,部分酒厂注意技术改进。

民国时期的酿酒工艺有了很大进步。几乎凡出产杂粮之县份均能烤制普通白酒(俗称烧酒),且平均出酒率均达到40%以上。说明酿酒技术的成熟及行业门槛的放低。而一些名酒的基本定型也大多在民国时期,如郎酒的酱香型技术诞生于清末,成熟于民国时期。五粮液的技术配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最终定型于民国中期。泸州老窖作为浓香型的代表,早已闻名遐迩,一些地方如万县、合川、璧山等地甚至出现了仿效的现象,但其影响最大的还是抗战时期。

部分糟房开始注意技术改进并使用科学仪器来监管生产,如五粮液生产中“使用了比重计(酒精表)、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设备来测量窖池发酵温度、下曲药时粮糟的温度以及糟房内的温度

四川省粮食增产督导团每月都要对粮食的播种、生产、收成及气候进行调查,并据此进行农作物产量估计,其结果应当可信。如对1944年高粱产量的估计就与《四川经济季刊》2卷2期《四川经济统计》接近。

有关酒类工艺的进步参阅下述资料:王思铁:《郎酒史话》,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龚咏棠、黄国光:《中国名酒“五粮液”》,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3编《经济工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郭来虎主编:《中国第一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和湿度,勾兑加浆时的酒精浓度等等。同时做好有关数据的详细记录。从而在酿造技术方面,逐步改变只凭经验的眼看、鼻闻、口尝、手摸、足踢的原始传统操作手段。这样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测量掌握有关数据。对于提高质量和扩大生产规模,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12]。

其次,出现部分专业酒厂,酒的品种生产齐全,并有明确的生产管理分工;同时大多数酿酒作坊(糟房)规模过小,家庭酿酒比较普遍。酿酒在农村仍是一种家庭副业。

专业酒厂大多是由专业作坊发展而来,与近代机器工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处于手工业作坊向近代企业转化的过程之中。重庆允丰正的注册资本1940年达到45万元法币^[13],市中心的公司本部即有工厂8间,每坛装酒30斤的酒坛3万余个^[14],1940年后在郊区还建有分厂,在泸州、万县、成都还设有原料采购和销售的窗口,重庆市区亦有两个销售门市,其营业利润相当可观,在行内算佼佼者。大川酒行是一家股份公司,其1940年成立时的股本为200万元法币,超过了允丰正。生产泸州大曲酒的糟房以温永盛、天成生、爱仁堂规模著称。

这些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品牌的糟房,已开始出现了生产管理的分工。重庆允丰正在抗战中正式改为股份制性质,所有股东中只能选派一人参与管理。生产过程中有专业制曲的、专门生产的、专门采购原料和销售的以及专门管理工厂的经理(执事),可以说各部门分工明确,具有典型的近代化生产组织形式。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全年利润的10%用于职工分红^[15],有效地稳定了职工队伍,融洽了劳资关系。重庆大川酒行的营业计划书中甚至将职员的红利提到23%^[16]。

泸州的温永盛老窖规模不小,又是专业酢房,应有内部分工。还有当时十分有名的爱仁堂香花酒,“下设内管事陈应谦负责收支帐目,对外设外管事吴焕然,负责社会交际,联系批发业务和组织原料、采购鲜花鲜果等;生产车间和包装由韩登敖领班;伙房由刘顺和牵头。对内对外事务均

由管事包揽,上有老板,下有领班,各司其职,井井有条”^[17]。天成生糟房“会计、采购、推销等人员的选聘,既重视技术特长,又重视职业道德,因而强化了管理班子,为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18]。

但民国时期一般的酿酒作坊规模仍然很小。一般只有一二排桶,年产量只有1-3万斤,永川、江津单个酢房能年产5-8万斤(表2),规模就算大的了。1942年政府对酒税实施认额摊缴,规定酿户年最低产量为24 000斤^[19],对那些小作坊而言,还有些偏高。充分说明当时酿酒业规模小、产量低。1944-1945年,德阳酿酒业15户,职工45人,年产量12万斤^[20],平均一个糟房只有3人,人均产量只有0.3万斤多一点。璧山县,“酿酒老板发了财,不少人争相办酿酒作坊。户户种高粱”^[21],成渝沿线“酒作坊受其原料产地的控制,而成零星的分布”^[22],均属此种情形。此外,四川农村的家酿酒十分普遍。家庭酿酒作为农村副业,有两种情况:一是使用家用灶具和工具煮酒,不需要添加新设备,所煮酒多为糯米酒(秬糟)和杂粮酒(以高粱为主),饮用时可以连酒糟一起饮用,因此其生产不需要资本,原料系自产。政府规定此种情形酿酒每年不得超过100斤,而且须照章纳税。另一种是适当添加煮酒设备如锡锅、发酵桶等,不使用雇工,煮酒多少依原料是否充足、农忙与否及市场需求而定。其固定资产在100元左右(1937年币值),几乎无流动资金,也可来料加工,收取工时费。这类糟房在高粱主产区比较普遍地存在。如璧山等县,“多数酒作坊分布在农村之间,……成为农村的一种重要副业,使农村经济因而增加其繁荣之象”^[23]。

再次,主要产区集中在江河流域。

四川酒业的重要区域分布于四川(包括重庆)境内的长江、沱江、岷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六大江域,而且呈西北少,东南多的趋势,若从内江、遂宁划分,则是川东多于川西。从全省来看,泸州、重庆、江津、绵竹、内江是集中产区。靠近江河流域,不仅有利于酿酒取水,而且宜于原料

及成品的运输。如江津白沙镇,“高粱为农人所极重视之农产物,每年出产,本镇约2万石以上。因水运之便利,上自朱家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油溪以上之货,均各集中于白沙。原料之便于收集,亦为产酒之一原因。……酒之销场,除十分之一二供本县需要外,十分之八九俱运销远地。上自洪雅嘉定,下至涪丰忠万,以及嘉陵江上游之合川三汇,黔省之贵阳、赤水、桐梓、遵义,均撑出白沙烧酒之招牌,人争购之”^[24]。犍为“水性既宜于酒,是以酒业之发达,在上川南首屈一指”,其外购原料多沿长江一带采购自宜宾、南溪、泸县等地,销路也以岷江、长江流域各县为其重点^[25]。水,是四川酒业在过去和现在发达的重要原因。

三、抗战期间四川酒业发展原因探讨

四川经济在抗战期间得到较快发展,人所共知。但一般意义讲,酒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消耗品、奢侈品,在战争期间本不应提倡,属限制发展之类。但四川酒业在此期间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准入条件降低。民国时期,经过不断探索,普通白酒的酿造技术、配制酒的配方技术已趋于成熟,而一些高档酒如泸州大曲、绵竹大曲、郎酒、允丰正技术日臻完善。酿酒所需的设备简单,作为农村副业的时烤时停之糟房,设备投资仅需100元左右(1937年币值),实在不行,农民煮饭用的锅(蒸),睡觉用的棉被(发酵),生火用的柴禾(能源)亦可作农村家酿酒的基本条件。这样一来,高低档酒并存,不同酒种百花齐放,原料设备之易得,生产时间的随意,都无意间成了四川酒业发展的客观条件。

第二,原料采购便利。抗战期间,除个别年份外,四川粮食总体丰收,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增长及抗战的需要。酿酒的主要原料高粱,其出产量是南方诸省中最高的^[26]。而从高粱所含的食品化学成份看,酿酒才是其最佳用途。故四川酒业的发展有丰富的原料,而且解决了高粱的出路,提高了

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后来,由于各糟房竞相生产,原料采购量增大,四川的高粱均不敷酒业发展的需要,高粱的收购竞争加剧。1944年四川全省高粱的缺口达6000多万斤。

第三、酒业有利可图。虽然因时局动荡和物价上涨,抗战期间的制造业及商业利润的空间均有限,但酒业发展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如重庆大川酒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0年,其招股计划书中载明,公司总股本200万元,用于厂房设备30万元,生产器具30万元,原料采购100万元,流动资金40万元^[27]。该公司计划年度销售260万元,原料采购160万元,说明其原料采购资本一年周转1.6次,周转速度很慢,而且其年度利润率计划也才13%。这并非一个理想的营业计划,但却得到来自银行、商业建筑、医院、会计等行业38位发起股东的同意,说明各股东可能故意隐瞒了计划中的营业利润(公司注册时营业计划要上报)、且看好酒业的发展。比大川成立早三年的重庆允丰正股份有限公司因其经营高档黄酒,营业利润计划好一些^[28]。生产郎酒、五粮液的厂家,利润更高一些。宜宾孙望山回忆说:“曲酒价每斤洋毫4角5分,已有利可图。而五粮液每斤1.2元,当然获利更厚,其毛利率达50%”^[29]。商业经营方面,乐山1938年经营酒业者19户,销售总额542 123.62元,毛利总额76 180.63元,毛利率14.05%,纯利额18 658.86元,纯利占其资本总额的23.35%^[30]。1943年绵阳经营烟酒业者其纯利占资本总额的50%^[31]。如果是作为农村副业时烤时停之糟房,则基本上无利可图,无非作保本计,解决高粱的出路,赚点酒糟喂猪。如乐至县倪和兴等人“原为农人副业,赚糟饲豕,图粪培农”^[32]。“多数酒作坊……可出产大量的副产品,如酒糟子即为优良的饲猪料。所以一个较大的酒作坊可以圈养数十只乃至数百只的肥猪。而养猪又有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即是猪粪,是为农村最为需要的肥田品。尤其在柑橘树分布较多的区域所需的这种糟肥为量最大。这一些副产品的出产也都是促成本区域酿

酒业甚为发达的重要因素。”^[33]

第四,市场需求扩大。抗战中,成渝公路沿线一带的主要产酒县都得益于酒精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资内简隆等县;大多数产酒县都因战时四川经济的繁荣、需求增加而提升产量。绵竹“年前财部统一税收,将地方苛杂除去,同时又因川北人口增多,需要增加,所以绵竹酒转较抗战前繁荣”^[34]。川北人口不是突然增多的,如三台就是东北大学等省外学校、企业的所在地,人口大量内迁,扩大了对酒的消费需求。重庆在1938年,“全市消耗干酒一项,每月在一千担以上,以重量计,平均共有十万余斤,以每百斤36元之市价计算,每月须耗洋36 000余元。此外,曲酒消耗,每月亦有数百缸。而一般餐馆及应酬中风行之允丰正制造之黄酒,4月份收入达18 000余元。由上列数字以观,是项消耗实足注意也”^[35]。随后,内迁重庆的人口迅速增加,对酒类消费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允丰正黄酒之所以在抗战中声名远播,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外省人对其青睐有加。有些地方,虽是企业自主行为,但更体现了市场需求的生长。邛崃酒业“战前平常,战时颇称繁盛,将来颇有发展之趋势”^[36]。

第五、政府鼓励生产。政府以国防所需及增加税收两方面从三十年代后期起转变了对酒业的态度。以前总体是限制酒业的发展,一遇灾荒,即严禁生产。但抗战开始,即使灾荒之年,政府虽然也限酿、禁酿,但只禁止使用主要粮食,却不限制杂粮酿制。1938年四川省政府发布公告称:“现值抗战期间,米麦两项,于军需民食,关系重大。究应节制消耗,以资给养。凡以米麦酿酒者,应绝对禁止。惟制造曲药,及以糯米酿制仿绍酒、老酒,不在限制之列。除通令查禁外,合行布告严禁。如敢故违以食米小麦酿酒,定于没收。并严究不贷。其各凛遵”^[37]。从其强调米麦的角度看,此时主要查禁专以米麦酿制白酒者,杂粮酿酒、糯米酿酒则未加限制。另据四川省政府第537次省务会议决议,除高粱、青稞、糖泡、漏水四项外其余各项粮

食仍一律严禁酿酒^[38],这些都说明政府已经允许用高粱酿酒。至此,政府对于酿酒原料的认识变得较为清晰,即有所禁有所不禁,不再单纯地禁止酿酒,甚至对于民生关系不大的、适宜酿酒的原料还鼓励生产。

对于与酒精厂签有专供合同的糟房,政府还免征非常时期之加征五成税^[39]。

与此同时,政府怕损失税源,出台了很多措施,严格糟房停产、减产。如1944年2月,四川省政府粮2字第2790号训令指出:“查川省高粱一项,虽列入取缔囤积物品(指‘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之内,但此仅就一般规定,而酤户所认产量月有定额,不得无故停减。其储蓄高粱乃系维持陆续酿造之用,自与囤积有别。如一律取缔储备,不予变通,则各酤户必致因原料中断被迫停酿。不特影响税收,而酒精原料之供给亦感困难,于军事、交通所关亦巨”^[40]。看来,为了维持酒的产量,关于酿酒用的粮食储备,部、省两级都是很重视的。1944年酒类产量一度达到顶峰,与此有一定关系。

此外,四川良好的水源和气候,1941年公布的《国产菸酒类税暂行条例》除去苛捐、通售全国概不重征,以及当时各业均奋力支持抗战的行为等都促进了战时四川酒业的发展。

总之,抗战时期,民族经济遭受十分严重的破坏,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酒业经济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了民国时期十分脆弱的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承担了重要的经济职责和国防职责,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允丰正等厂家所说:“溯自战时,洋酒阻运,后方土产黄酒,稍得苏息之机,每年纳巨税于国库,实尽我小手工业贡献国家之义务”^[41]。四川酒业同仁,一方面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为国防动力所需及政府税收的增加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他们的行为表明,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传统手工业也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达礼.江津县白酒生产概况[J].四川省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99.
- [2] 犍为酒业调查[N].四川月报(12卷2期),1938(2).
- [3] 达县志[M](卷12).食货门·制造,民国27年(1938年).
- [4] 四川省江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县志[M].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325.
- [5] 民国时期绵竹县酿酒情况表[R].四川省绵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2003.132-133.
- [6] 李邦宁.解放前的绵竹大曲酒[J].四川省绵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绵竹文史资料选辑(13),1994(269).
- [7] 赵令景.四川粮食问题之研究[A].萧铮主编.民国2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9辑)[C].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25193).
- [8] 李德芳、林建曾.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2卷[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682-684.
- [9] 华问渠口述、王萼华记录整理.贵州成义茅酒(华茅)纪略[J].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229).
- [10]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4.
- [11]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Z].“各省历年高粱产量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2-88.
- [12] 尹孝根.不会忘却的怀念[A].宜宾市政协.美酒慰忠魂[C].宜宾飞马印务公司,2000.252-253.
- [13] 重庆市社会局档案“允丰正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录(1940年10月28日及1941年3月16日)”[Z].重庆市档案馆:全宗0062,目录2,卷号872-1.
- [14]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Z].第8章第4节.饮食品工业.酿造业.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8.R93.
- [15] 卢澜康.我所知道的重庆允丰正[J].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1962.83-97.
- [16] 重庆大川酒行股份有限公司档案(1940年)[Z].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0060,目录2,卷号354.
- [17] 刘志翔.泸州花酒店爱入堂[J].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9.84.
- [18] 刘志翔.泸州老牌名酒天成生大曲[J].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9.125.
- [19] 菸酒税稽征方法之改进[A].财政部税务署.十年来之货物税[C].1943.9.
- [20] 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2.241.
- [21] 四川省璧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璧山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55.
- [22] [23] [33] 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Z].四川省档案馆,1945年4月.66.
- [24] 江津调查[R].四川经济月刊.6卷6期,1936.17.
- [25] 犍为县志[M](卷12).财政,民国26年(1937年).
- [26] 许道夫.各省种植面积、产量及产额(1914-1949)[A].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2-88.
- [27] “重庆大川酒行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Z].重庆市社会局档案.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0060,目录2,卷号354.
- [28] “允丰正股份公司章程”[Z].重庆市社会局档案.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0062,目录2,卷号873.
- [29] 孙望山.宜宾“五粮液”[J].四川省宜宾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工商专辑,1982.35.
- [30] 焦宗华、周邠.四川乐山区工商营利事业统计报告[R].财政部.财政评论(4卷3期),1940.139-141.
- [31] 朱健民.绵阳营利事业概况[R].四川经济季刊(1卷3期),1944.400-402.
-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5辑2编).财政(2)[Z].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545.
- [33] 廖皓龄.绵竹大曲酒之调查与研究[J].中农月刊(1卷4期),1940.105.
- [34] 重庆酒业调查[N].四川月报(12卷5、6合期),1938.196.
- [35] 吴健生.邛崃经济概况[R].四川经济季刊(1卷2期),1944.368.
- [36] “二十七年(1938年)粮民财字第18403号”档案[Z].成都市档案馆:全宗38,目录6,案卷2466.
- [37] “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代电(1942年)”[Z].绵竹市档案馆:全宗35,案卷979.
- [38] 杨公庶.抗战以来后方之酒精工业[J].西南实业通讯(8卷5期),1943.8.
- [39] 民国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1944年2月)[Z].成都市档案馆:全宗号38,目录6,卷号2508.
- [40] “允丰正等十余厂家请愿书(1947年3月25日)”[Z].财政部重庆货物税局档案.重庆市档案馆:全宗0274,目录1,卷335.

(责任编辑 张 斌)